

窟前建筑是云冈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5、6窟前目前还保存着清初建造的四层木构楼阁，令人印象深刻。从《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等文献记载看，辽金时期也有大规模的窟前建筑。根据新中国成立前日本人的小规模发掘，在辽金地层下还有包含北魏建筑构件的地层，暗示存在更早的北魏时期的窟前建筑。但由于发掘面积比较小，且报告介绍较为简单，大部分窟前建筑的规模、结构并不清楚，甚至有学者对是否存在北魏时期的窟前建筑一直将信将疑。

清代以前的窟前建筑地上部分都已经不存在了，探索早期窟前建筑的规模、结构、年代、演变等问题，很早就有学者寄希望于窟前地下遗址的科学发掘。1992年、1993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组成云冈联合考古队，连续两年对云冈石窟窟前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这次发掘荣获“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3年12月，由云冈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大同市博物馆联合编著的四卷本《云冈石窟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终于出版了。《报告》前两册为文字介绍，后两册是彩色图版。除了发表1992年、1993年发掘资料外，还收录了其后的 一些补充发掘材料和1987年龙王庙沟遗址发掘资料。新中国成立前日本人的发掘资料、20世纪70年代发掘情况，《报告》也将其作为附录收入。总之，历年来窟前遗址发掘资料基本都网罗在了《报告》中。此外，附录中还收有一些对出土遗存的科学分析报告，包括出土瓷器、动物骨骼、彩绘颜料、铁器等，丰富了对窟前遗址的认识。

因为对窟前遗址资料期待已久，所以在《报告》刚出版以后，我就拿来做了仔细研读，获得了极大的收获。我认为这部报告是云冈石窟研究的又一里程碑之作，具有很多优点，下面谈谈一些粗略感受。

体例完备发表全面

《报告》按照窟前建筑的分组来发表资料，如将14～20窟窟前建筑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以单个窟或者昙曜五窟发表资料，这是符合建筑实际的。每部分又分遗址概况、地层堆积、各时期文化遗存和小结。可能因为前面的章节是由不同的人写的，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和前面重复，《报告》没有在最后设置总的结语，我认为这种体例也是可以接受的。

全面翔实地公布发掘材料，是考古工作中最基本的要求，但并不是所有报告都能做到。实事求是地说，云冈石窟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是北魏时期，其次是唐代到辽金，明清时期则不太受重视。但《报告》一视同仁，将相关遗迹、遗物进行了全面发表，特别是明清时期的遗存。对于报告整理者而言，未必没有个人的研究偏好，但考古报告的编写通常只有一次机会，所以整理者应该尽量减少个人主观喜好的影响，有义务将材料全面公布。《报告》做到了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

层次梳理较为清楚

遗址发掘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按层位发掘并收集遗物，把遗存的层位关系梳理清楚，才能为学界提供可靠的研究材料。

层位的梳理，主要应在现场发掘过程中做好，但后期室内整理中多少会有一些调整。《报告》对发掘原始记录层位进行过修正（只要对比一下发表过简报的第3窟及龙王庙沟地层剖面图就能看出来）。《报告》对层位梳理、编号是较为清楚的。层位编号采用数字和字母结合的方式，一个大阶段使用一个数字，如①、②、③，大阶段下的不同小层位再用A、B、C区分，较为方便。这里当然掺杂了整理者的个人观点，但即便有人不同意报告对层位年代的判断，也不影响资料的科学性。

因为有可靠的层位关系，还能纠正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日本学者对1938年、1940年发掘的北魏、辽金瓦当做了编年，有一类出土于9、10窟前的莲花纹瓦当（《云冈石窟·遗物篇》图9之128～130），被定为云冈2期。实际上，根据1992年、1993年的发掘，这类瓦当也见于第3窟、11～13-4窟金代窟前建筑的倒塌堆积中，并非北魏时期。

提供大量新知新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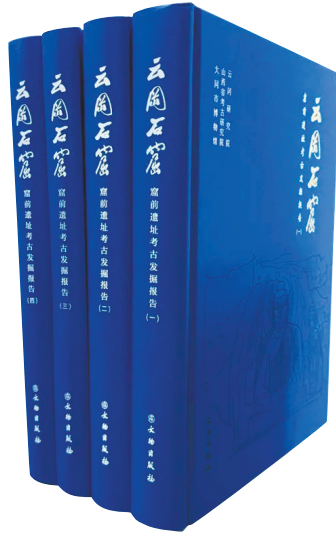
报告体量巨大，内涵丰富，提供了大量新材料及新认识。这里略举一例。在报告出版之前，我已经知道20窟前出土了西立佛残块，但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就是初窟的立佛残块。《报告》对这些残块进行了拼对复原，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其特征。立佛是由多层多列石块拼成的，每层石块高度基本一致，而且每块顶面凿有1-3个卯口，石头的岩性也和原西立佛所在不同，说明这些石雕是原立佛相应部位的替代物。可见我原来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在明白这点之后，就会意识到，这种修补方式是较为合理的。

充分吸收前人成果

从报告中能看出，整理者对云冈石窟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最近几年的相关研究了然于胸，对新的成果也能及时吸收，如彭明浩对横梁槽的研究，宋瑞对扩展面的研究。还吸收了李含笑对辽代篛纹陶器的

云冈石窟研究的又一里程碑——读《云冈石窟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郭军军



研究，因此不仅辨识出了云冈的辽代篛纹陶器，对相关地层的年代判断也更为准确。

报告的出版距发掘有30年时间，虽不免有迟到之憾，但也因时间充足而广泛吸收各类研究成果，研究结论才能较为可靠。我想，如果十年或者二十年前报告就出版的话，结论很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完善。

结论审慎平实可靠

因为有了上述几个基础，才能有较为可靠的研究结论。比如对窟前建筑的年代判断，我认为大部分都无懈可击。相信读者在阅读报告的时候，会和我有一样的体会。

是否存在北魏时期的窟前建筑，是云冈石窟研究中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日本人早年对昙曜五窟前遗址的发掘，已经观察到探沟最下面有一层所谓“黑土层”，只包含有北魏瓦片和木炭屑，因此他们认为窟前有北魏时期的建筑，很早就毁于火灾。但由于发掘面积较小，且资料发表较为简略，不少学者对此心存疑虑。彭明浩看到过1992年、1993年发掘内部资料，在此基础上，结合崖面上北魏千佛避让与梁孔有直接关系的横梁槽的情况，有力地证明了北魏窟檐建筑的存在。《报告》首次揭露了昙曜五窟崖面大梁孔和地面柱穴的对应关系，而地面柱穴被北魏倒塌堆积所叠压，从层位上再次无可辩驳地证明北魏时期确实已经有了窟前建筑。

勇于修正早年观点

最突出的是龙王庙沟部分。龙王庙沟西侧窟前遗址发掘于1987年，简报最初发表于《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限于当时的认识，发掘者认为出土物均为辽代，从而将龙王庙沟建筑及其使用时代定为辽代。

《报告》虽然沿袭了简报的一些认识，但又指出出土遗物中有金代风格的器物，因此认为“窟前建筑及其使用时代上限为辽代……可能一直到金代还在使用”。虽然没有指明哪些是金代遗物，但结论基本是可靠的。

遗址中存在大量金代遗物是不争的事实，出土瓷器中，定窑轮菊纹盏、印花碗、莲瓣碗，耀州窑碗，均是典型的金代器物，所以这座窟前建筑群肯定在金代使用过。至于其上限是否能早到辽代，我认为并没有太充足的证据。仅有1987DYLT171③：21是较为明确的辽代晚期浑源窑产品，将建筑上限定为辽末是可以接受的，但主要使用时间和废弃时间，应该是在金代。

存在问题瑕不掩瑜

当然，任何报告都会存在一些问题，《报告》也不例外。一是对明、清遗存区分不足，多笼统称之明清时期。张焯先生在序中也指出对辽金出土器物年代分辨上不够准确。二是部分器物断代存在问题。主要是将明清地层里的一些瓷器误定为辽金时期。三是部分瓷器产地判断有误。报告后面附有部分出土瓷器的检测报告，对定窑、耀州窑瓷器的判断是正确的，但被定为北京龙泉窑产品的一些白瓷，实际上有些是明确的浑源窑产品，有些主要见于雁北地区，应是当地所产，和龙泉窑没有关系。错误的原因大概是数据库里没有雁北窑场的东西。虽然存在以上这些问题，但对窟前建筑年代这样的大问题没有什么影响，瑕不掩瑜。

营造学社的梁思成等人1933年调查了云冈石窟，在《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中，他们已经指出北魏、辽金时期窟前建筑的存在，但又认为“论到石窟寺附属殿宇部分，我们得先承认，无论今日的石窟寺木构部分所给与我们的印象为若何；其布置及结构的规模为若何，欲因此而推断千四百余年前初建时的规划，及历后逐渐增修建造的程序，是个不可能的事。”他们只能根据文献中的少量记载和实物做一些推测，并将研究的希望寄托于新兴的考古发掘。

读了《云冈石窟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我们可以自信地告诫前辈学者，经过科学的发掘与整理，已经变“不可能”为可能了。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云冈石窟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编著：云冈研究院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大同市博物馆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

视点

陶俑说尽古今事 太原犹唱北齐风

——《太原北齐陶俑墓》评介

车环宇 高丁丁

欣闻《太原北齐陶俑墓》一书出版问世，感慨良多。作为首部太原出土北朝陶俑墓葬合集的报告，这本书不仅是团队多年来智慧与汗水的结晶，也是读者综合了解北齐历史文化的入门之选。提及北齐王朝的历史，在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长河中显得短暂而又晦涩，太原深埋地下千年的北齐陶俑则以凝固的姿态承载了公元6世纪那段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史诗。它们恰似一把钥匙，为我们揭开晋阳霸府的鼓角铮鸣，串联起丝路重镇的驼铃声声。陶俑仿佛历史的经纬，编织出一幅幅形象生动的北齐浮世绘。

回顾北齐的历史背景，作为继北魏、东魏后的又一个王朝，北齐于公元550年建立至577年被北周攻灭，享国不过27年的时间。但它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以至于连陈寅恪先生梳理隋唐政治文化制度渊源后也认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纭，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束者是也。”由此可见，北齐乃魏晋南北朝典章制度的集大成者，后世的隋唐更是与北齐有很深的渊源。

在本书的立项之始，团队就考虑到北齐所遗留的各类遗迹主要分布于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份，这也大致是北齐当年的疆域所在。尤其在古郛城、晋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北临漳与山西太原周边，更是散布着大量该时期的遗址、石窟寺和墓葬。随着近年来晋阳考古捷报频传，在太原周边陆续发现了诸如童子寺遗址、徐显秀墓壁画等许多重要的北齐遗迹，而对于它们的学术研究也向全世界揭开了北齐王朝那神秘晦涩的面纱。

就目前的学术研究而言，北齐文化具备极为鲜明的地域特色。从北齐墓葬中出土的各类陶俑来看，各地间虽类型大致如一，其形制风貌却又各具特点，其中尤以晋阳与郛城两地陶俑最为典型。就体型讲，郛城及其周围地区延续了北魏后期秀骨清像的特点，同时也显示出略向丰满发展，体态适中的趋势；而晋阳及其周围地区的北齐陶俑体态较壮、面颊饱满、腹部前突，更具有游牧民族的大气磅礴。此前杨泓先生曾对分布于晋阳与郛城为中心的北齐墓随葬陶俑，就类型和制作特



征做过详细研究，也指出两地陶俑的共性与差异。

这些陶俑承载了厚重的北齐文化，是我们研究当时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的重要资料。诸如各类武士俑，为我们研究北齐军制、装备、兵种、军服等提供了充足的物质证据。其他诸如胡人俑等则对于我们探讨北朝丝绸之路的历史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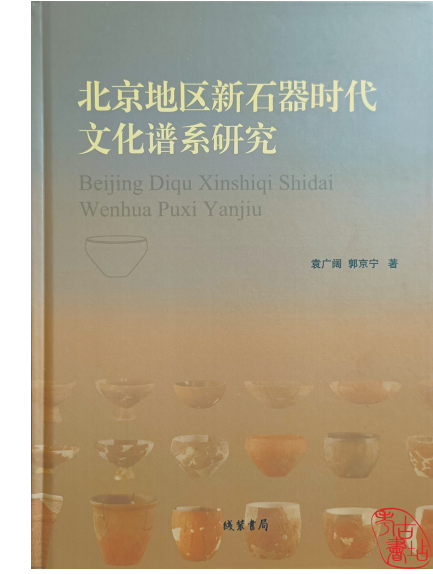
今天的我们在欣赏北齐陶俑之时，首先应对北齐晋阳的历史地位有所了解。晋阳城自诞生以来，一直是中国北方的重要都会、军事重镇。尤其是北魏后期，尔朱荣雄踞晋阳而遥制朝廷、争霸天下。其后高欢“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自此“军国政务，皆归相府”，时号“霸府”。自公元550年高洋代魏建齐，虽建都于郛，但政令却由晋阳而出，史称“别都”，开创了北齐“郛—晋阳”两都制格局，造就了晋阳城在北朝时期的赫赫地位，此时的晋阳以“霸府别都”之威名而荟萃精英，繁盛有逾郛都。明白了这些，自然就会明白晋阳北齐墓葬何以出土如此之多的武士类陶俑。

其次必须正视地缘格局对于北齐文化形成的影响。晋阳作为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要地，也是各民族交流融合之中心。它既是中原王朝北进靖边的军事重镇，又是游牧民族南下逐鹿的桥头堡至。此外，晋阳深受北方游牧民族剽悍善战、骑射

北京文明化进程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读《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研究》有感

赵青山 王涛



学科整合研究的基础上，多层次、全方位分析当时的社会生产与社会经济形态，揭示其生产关系和组织结构等，为探索北京地区早期文明形成与发展机制提供新的视角。研究结合石器工艺、制陶工艺、气候变迁、河流涨落数据，提出了“交汇地带”理论，解释了文化面貌的混杂性和不同文化因素的地方化（如红山、中原文化的地方化），探讨文化演变的生态动因。作者还强调未来研究者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聚落形态演变、经济贸易、技术手段、社会组织、观念信仰等专题研究中去，进而研究北京地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与文明化过程中的作用。

对比研究的视野是本书的另一亮点。作者并未局限于北京地域，而是将目光投向周边文化区，通过分析河北北福地、姜家梁等遗址的房址、器物特征，揭示了中原磁山文化、北方兴隆洼文化等对北京地区的渗透与互动。书中详细探讨了不同时期三大文化区（北方、中原、海岱）在此

尚武精神的影响，其地素有“人性强悍，习于戎马”，“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之美誉。尤其是从东汉开始，南匈奴、乌桓等游牧民族陆续南徙，被政府安置今山西地区，“皆家于晋阳、河涧之滨”。据谭其骧先生研究，在当时山西境内所设郡治中几乎都有胡人杂居，北部诸郡甚至出现了“胡多于民”的现象。从太原地区出土的北齐陶俑身上，无论是面相体型还是服饰兵器，无不透露出马上民族的精神面貌。

此外谈及北齐文化，不应忽视当时丝绸之路中的中西方文化互动。自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攻占河西走廊后，丝绸之路便被再次打通，大量胡人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书写了灿烂的文化篇章。其中尤以开凿于北魏文成帝拓跋濬时期的云冈石窟最为典型。其后随着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即元宏）迁都洛阳，诸多来自西方的胡人亦随之进入。东魏以来，首都虽迁至邺城，但大丞相府设在晋阳，故北齐建立后便以晋阳为别都，皇帝常居晋阳，于是胡商和希冀军功的胡人亦尾随而来。根据北齐时期出土墓志的研究，北朝晚期晋阳的胡人多来自鱼国、曹国、翟国、康国、安国和突厥诸国。因此在太原北齐陶俑中，见到胡人形象，并不足为奇。

最后谈及这本凝聚了团队智慧心血的《太原北齐陶俑墓》，从真实性来看，它的每一图版都具备准确名称、出土地点、时间、编号、测量、分类、质地、纹饰、色彩、工艺、线图和简单描述，为读者提供了清楚的直观形象；其次它展示了陶俑的不同服饰、姿势、艺术特点、风格等，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此外本书中专附多篇学术文章，对北齐陶俑的制作工艺、解读和比较、晋阳陶俑服饰的来龙去脉、源流演变及其影响都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千年陶俑，诉说历史故事；今朝太原，犹唱北齐遗风。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历史赋予的开放包容、实在坚韧的城市精神依然镌刻在一代代太原人的心中。读罢此书，零乱数语，如有疏漏，望读者不吝指正。

（作者单位：太原市博物馆 山西考古博物院）

《太原北齐陶俑墓》

编著：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2月

交汇的图景，如雪山一期文化与小河沿文化的互动，后冈一期、二期文化在北京地区的影响等。这种跨区域的对比不仅弥补了本地考古材料的不足，更凸显了北京作为文化“熔炉”的枢纽地位，生动诠释了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六大文化区”理论，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微观实证。

值得指出的是，本书两位作者均为北京新石器考古领域内具有丰富研究经验的专家，袁广阔教授荣获“北京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等荣誉称号，主持过多个北京考古相关的研究项目，发表《东胡林遗址：新旧石器时代文化过渡的见证》《镇江营文化的发现和认识》《镇江营一期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蠡探》《雪山一期文化的再认识》等与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相关的研究；撰写的《关于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资源利用的几点建议》内参还获得北京市领导批示。郭京宁研究员长期在北京地区进行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先后参与或主持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平谷上宅遗址、昌平雪山遗址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或资料整理工作，曾担任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参与《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的起草与制定，出版《北京考古—史前卷》《当代北京考古史话》《温故思新》等专著20部。

总体而言，《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研究》一书不仅是北京新石器考古的集大成之作，更通过创新方法与宏观视野，重新定义了区域考古研究的范式。它既为学界提供了翔实的编年谱系，也通过生产模式、聚落形态等社会层面的分析，揭示了早期人类适应环境的智慧与文明演进的动力。书中对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剖析，尤其彰显了北京在中华文明化进程中的独特价值，为后续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考维度。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研究》

作者：袁广阔 郭京宁

出版社：线装书局

出版时间：2021年2月